



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藍田呂氏集

(上冊)

〔宋〕呂大臨等著 曹樹明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藍田呂氏集（上册）

〔宋〕呂大臨等著 曹樹明 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考古圖記

莊周氏謂儒者逐逐長真
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
芻狗之論重以濂父盜跖
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
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
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
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
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
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
王之可法克已從義謂之
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
至于坑殺學士燬籍與籍
盡愚天下之民而後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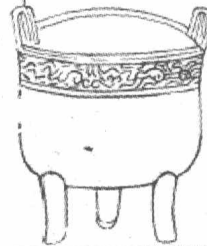
庚鼎 廣二寸五分

重
來
廣



辛鼎 同上

辛
辛
辛



欽鼎 同上

小
中
大



右三鼎皆得於京師

庚鼎高六寸有半深辛有半徑手三分容二升有半

辛鼎高六寸深辛有半徑手三分容一斗
欽鼎高六寸有半深辛有半徑手三分容一斗
銘皆有字在耳後廣二寸五分今大鼎未見
按史記夏商宋有鑑其若皆以甲乙為號
則此三鼎雖皆夏商之器

《考古圖》明初刻本書影



2010 年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石墩

總序

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宋鳳翔府郿縣（今陝西眉縣）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張載出身於宦宦之家。祖父張復在宋真宗時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死後贈司空。父親張迪在宋仁宗時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張迪死後，張載與全家遂僑居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講學，世稱橫渠先生。他的學術思想在學術史上被稱為橫渠之學，他所代表的學派被後人稱為「關學」。張載與程顥、程頤同為北宋理學的創始人。可以說，關學是由張載創立并於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的地域性理學學派，亦稱關中理學。

關學基本文獻整理與相關研究不僅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也是體現中國思想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舉措。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和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開拓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對上起於北宋、下迄於清末民初，綿延八百餘年的關中理學的基本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於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關學文庫即將出版發行之際，我僅就關學、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關學的思想特質、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等談幾點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一、作為理學重要構成部分的關學

衆所周知，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與新階段，一般被稱為新儒學。但在新儒學中，構成較為複雜。比較典型的則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南宋學者呂本中較早提到「關學」這一概念。南宋朱熹、呂祖謙編選的近思錄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學發展的統緒，關學是作為理學的重要一支來作介紹的。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

「濂學」、二程（程顥、程頤）的「洛學」並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禕等人纂修元史，將宋代理學概括為「濂洛關閩」四大派別，其中雖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們的思想內涵及其影響並不限於某個地域，而成為中華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頁，即宋代理學。

根據洛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以及閩學代表人物朱熹對記載關學思想的理解、評價和吸收，張載創始的關學本質上當是理學，而且是影響全國的思想文化學派。過去，我們在編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學史上冊的時候，在關學學術旨歸和歷史作用上曾作過探討，但是也不能不顧及古代學術史考鏡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張載後學，如藍田呂氏等，在張載去世後多歸二程門下，如果拘泥門戶之見，似乎張載關學發展有所中斷，但學術思想的傳承往往較學者的理解和判斷複雜得多。關學，如同其他學術形態一樣，也是一個源遠流長、不斷推陳出新的形態。關學沒有中斷過，它不斷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融合。明清時期，關學的學術基本是朱子學、陽明學的傳入及與張載關學的融會過程。因此，由宋至清的關學，實際是中國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個動態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概念，它開啟了清初王船山學術的先河。

關學文庫所遴選的作品與人物，結合學術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關學編及關學續編、關學宗傳等，均是關中理學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張載，下至晚清的劉光蕢、民國時期的牛兆濂，能夠反映關中理學的發展源流及其學術內容的豐富性、深刻性。與歷史上的關中叢書相比，這套文庫更加豐富醇純，是對前賢整理文獻思想與實踐的進一步繼承與發展，其學術意義不言而喻。

二、張載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

佛教傳入中土後，有所謂「三教合一」說，主張儒、道、釋融合滲透，或稱三教「會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並舉的文化現象。當歷史演進到北宋時期，由於書院建立，學術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場所，從而促進了學人的獨立思考，使

他們對儒家經學箋注主義提出了懷疑，呼喚新思想的出現，於是理學應時而生。理學主體是儒學，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將它們融合為一個整體，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從理學產生時起，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學學派。比如，在「三教融合」過程中，如何理解「氣」與「理」（理的問題是迴避不開的，華嚴宗的「事理說」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響）的關係？理學如何捍衛儒學早期關於人性善惡的基本觀點，又不致只在「善」與「惡」的對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與社會及個人有何關係？君子、士大夫怎麼做才能維護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又能堅持修齊治平的準則？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中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可能一開始就有一個統一的想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進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加以解決。宋代理學的產生及不同學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發展歷史的寫照，因而理學在實質上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承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時朱熹閩學各有自己的特色。作為理學的創建者之一，張載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抱負，在對儒學學說進行傳承發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北宋時期，學者們重視對易的研究。易富於哲理性，他通過對易的解說，闡述對宇宙和人生的見解，積極發揮四書義理，並融合佛、道，將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張載與洛學的代表人物程顥、程頤等人曾有過密切的學術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學術思想上相互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宋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張載來到京師汴京，講授易學，曾與程顥一起終日切磋學術，探討學問（參見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張載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為二程表叔，二程對張載的人品和學術非常敬重。通過與二程的切磋與交流，張載對自成一言之言的學術思想充滿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因為張載與程顥、程頤之間為親屬關係，在學術上有密切的交往，關學後傳不拘門戶，如呂氏三兄弟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師道、游師雄、潘拯、李復、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在張載去世後一些人投到二程門下，繼續研究學術，也因此關學的學術地位在學術史上常常有意無意地受到貶低甚至質疑（包括程門弟子的貶低和質疑）。

事實上，在理學發展史上，張載以其關學卓然成家，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理論建樹，這是不能否定的。反過來，張載的一些觀點和思想也影響了二程的思想體系，對後來的程朱學說及閩學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這也是客觀的事實。

張載依據易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在基本點上和易的原有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虛即氣」的觀點，認為沒有超越「氣」之上的「太極」或「理」世界，換言之，「氣」不是被人創造出的產物。又由此推論出天下萬物由「氣」聚而成；物毀氣散，復歸於虛空（或「太虛」）。在氣聚、氣散即物成物毀的運行過程中，才顯示出事物的條理性。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這個觀點去看萬物的成毀。這些觀點極大地影響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張載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間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處於宇宙之中。由於三者都是氣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歸根到底，萬物與人類的本性是一致的。進而認為，人們「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鰥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這裏所表述的是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與張載有別，他們通過對張載氣本論的取捨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關思想，建構了「萬理歸於一理」的理論體系。在人性論方面，二程在張載人性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論。二程贊同張載將人性分爲「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但二程認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瑕的；「氣質之性」是氣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氣稟決定，稟清氣則爲善，稟濁氣則爲惡，正因為氣質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氣」的侵蝕而出現「氣之偏」，因而具有惡的因素。在二程看來，善與惡的對立，實際上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

朱熹將張載氣本論進行改造，把有關「氣」的學說納入他的天理論體系中。朱熹接受「氣」生萬物的思想，但與張載的氣本論不同，朱熹不再將「理」看成是「氣」的屬性，而是「氣」的本原。天理與萬事萬物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朱熹關於「理

一分殊」的理論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又說：「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朱子語類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論包括一理攝萬理與萬理歸一理兩個方面，這與張載思想有別。

總之，宋明理學反映出儒、道、釋三者融合所達到的理論高度。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於兩宋時期。張載開創的關學爲此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張子正蒙注序論）船山之學繼承發揚了張載學說，又有新的創造。

三、關學的特色

關學既有深邃的理論，又重視實用。這可以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學風篤實，注重踐履。黃宗羲指出：「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明儒學案師說）躬行禮教，學風樸實是關學的顯著特徵。受張載的影響，其弟子藍田「三呂」也「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宋元學案呂范諸儒學案），特別是呂大臨。明代呂柟其行亦「一準之以禮」（關學編）。即使清代的關學學者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依然守禮不輟。

其次，崇尚氣節，敦善厚行。關學學者大都注意砥礪操行，敦厚士風，具有不阿權貴、不苟於世的特點。張載曾兩次被薦入京，但當發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毅然辭官，回歸鄉里，教授弟子。明代楊爵、呂柟、馮從吾等均敢於仗義執言，即使觸犯龍顏，被判入獄，依舊不改初衷，體現了大義凜然的獨立人格和卓異的精神風貌。清代關學大儒李顥，在皇權面前錚錚鐵骨，操志高潔。這些關學學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體現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

最後，求真求實，開放會通。關學學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張載善於吸收新的自然科學成果，

不斷充實豐富自己的儒學理論。他注意對物理、氣象、生物等自然現象做客觀的觀察和合理的解釋，具有科學精神。後世關學學者韓邦奇、王徵等都重視自然科學。三原學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經典，強調用心求學，求其「放心」，用心考證，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獨立主見的治國理政觀念。關學學者堅持傳統，但並不拘泥傳統，能夠因時而化，不斷地融合會通學術思想，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由張載到「三呂」、呂枏、馮從吾、李顥等，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精神得到不斷承傳和弘揚。

四、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

關學文獻遺存豐厚，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涇野先生五經說、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收入四庫全書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於陝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或民間，其中有的在大陸已成孤本（如韓邦奇的禹貢詳略、李因篤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殘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殘本，現重慶圖書館存有原書，國家圖書館僅存膠片；收入的南大吉詩文，搜自西北大學圖書館藏周雅續）。即使晚近的劉光蕢、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傳亦稀世罕見。民國時期曾有宋聯奎主持編纂關中叢書（邵力子題書名），但該叢書所收書籍涉及關中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內容駁雜，基本上不能算作是關學學術視野的文獻整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將張載集、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關學編（附續編）、涇野子內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學叢書陸續出版，這些僅是關學文獻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統梳理關學學術文獻仍系空白。

關學典籍的收集與整理，是關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整理的嚴重滯後，直接影響到關學研究的深入和關學精神的弘揚，影響到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掘。

現在將要出版的關學文庫由兩部分內容組成，共四十種，四十七冊，約二千三百餘萬字。

一是文獻整理類，即對關學史上重要文獻進行搜集、搶救和整理（標點、校勘），其中涉及關學重要學人二十九人，編

訂文獻二十六部。這些文獻分別是：張子全書、藍田呂氏集、李復集、元代關學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張舜典集、馬理

集、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呂柟集、涇野子內篇、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韓邦奇集、南大吉集、楊爵集、馮從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顥集、李柏集、李因篤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賀瑞麟集、劉光蕡集、牛兆濂集以及關學史文獻輯校。

二是學術研究類，其中一些以「評傳」或年譜的形式，對關學重要學人進行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郿縣張載、藍田呂大臨、高陵呂柟、長安馮從吾、朝邑韓邦奇、藍屋李顥、郿縣李柏、富平李因篤、郿縣王心敬、咸陽劉光蕡等學人，共十一部。它們分別是：張載思想研究、張載年譜、呂大臨評傳、呂柟評傳、韓邦奇評傳、馮從吾評傳、李顥評傳、李柏評傳、李因篤評傳、王心敬評傳、劉光蕡評傳等。此外，針對關學的主要理論問題與思想學術演變歷程進行研究，共三部。這些著作分別是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

在這兩部分內容中，文獻整理是文庫的重點內容和主體部分。

關學文庫係「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得到了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大力支持。文庫的組織、編輯、審定和出版工作在組織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委員會領導下進行，日常工作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和西北大學出版社負責。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對這一功在當代、惠及後世的國家和省級重大文化精品圖書高度重視，親自擔任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自始至終關心支持文庫的編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江澤林、副省長王莉霞和省政府秘書長陳國強等對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給予悉心指導；原陝西省新聞出版局長薛保勤、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趙馥潔、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主任張祖培對文庫的策劃與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庫歷時五年編撰完成，凝結著全體參與者的智慧和心血。總主編劉學智、方光華教授，項目總負責徐曄、馬來同志統籌全書，精心組織，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鄭州大學等十餘所院校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協力攻關，精益求精，體現出深沉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責任感；他們孜孜矻矻，持之以恆，任勞任怨，樂於奉獻，以古人為己之學相互勉勵，在整理研

究古代文獻的同時，不斷錘煉學識，砥礪德行，努力追求樸實的學風和嚴謹的學術品格。出版社組織專業編輯、外審專家通力合作，希望盡最大可能提高該文庫的學術品質。作為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我謹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時間緊迫、經驗不足等原因，文庫書稿中的疏漏差錯難以完全避免。希望讀者朋友們在閱讀使用時加以批評指正，以便日後進一步修訂，努力使該文庫更加完善。

張豈之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藍田呂氏家族是宋代的名門望族，原籍河南汲郡（今河南省衛輝市）。該家族「皇考鵠，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賁，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范育呂和叔墓表，皇朝文鑑卷一百四十五）。呂賁死後，葬於京兆藍田（今陝西省藍田縣），於是他的後代就在藍田安家。呂賁有子六人，登科者五，宋史有傳者四，包括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和呂大臨。這部藍田呂氏集即是對此四人著述的整理，以下從生平、著述、思想、學術地位等方面對藍田呂氏兄弟進行簡要介紹。

一、呂大忠

呂大忠（一〇二〇—約一一〇〇），字進伯（一作晉伯），呂賁的長子。皇祐五年（一〇五三）中進士，始任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時，提舉他為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宋史卷三百四十）。為政的同時，呂大忠也重視修身和為學。二程遺書載：「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他不僅教誨馬涓「修身為己」之學，而且在秦州聽二程弟子謝良佐講授論語時，「必正襟斂容」（宋史卷三百四十）。謝良佐則認為呂大忠雖然很好，但處事過於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上蔡語錄卷一，四庫全書本）。元符末，呂大忠以寶文閣直學士卒。他的著作有前漢論三十卷、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

二、呂大防

呂大防（一〇二七—一〇九七），字微仲。皇祐元年（一〇四九）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嘉祐六年（一〇六六），知青城縣〔一〕。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改太常博士。治平三年（一〇六六）春，因論事於朝而遭貶，出知休寧縣〔二〕。神宗在位期間，通判淄州，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後又在華州、秦州等地爲官。哲宗即位後，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元豐六年至八年（一〇八三—一〇八五）知成都府。元祐元年（一〇八六），拜尚書右丞。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四月，呂公著告老退位，呂大防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自此，與范純仁同朝爲相八年，當任期間「四夷無事，中國晏然，年穀豐登，家給人足，可謂有功社稷矣」（王稱東都事略卷八九）。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太皇太后高氏駕崩，哲宗親政，變法派重新抬頭。呂大防由於此前「但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三〕被一再貶官。紹聖四年（一〇九七），被章惇陷害，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赴任途中於虔州信豐病死。

呂大防著有政目、西銘解、呂氏家祭禮一卷（與呂大臨合著）、神宗實錄二百卷、長安圖記一卷、呂汲公文錄二十卷、文錄掇遺一卷、杜工部年譜一卷、韓吏部文公年譜一卷。其中，杜工部年譜開創年譜體例，爲其後編年體詩集的先導。另，鑑於彖、象「始各爲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爲注，乃分綴卦爻之下，學者於是不見完經」（呂大防呂氏周易古經序），呂大防整理周易古經凡二十卷，「並錄爻辭、彖、象，隨經分上、下，共爲六卷，上下繫辭二卷，文言、說、序、雜卦各一卷」（武英殿聚珍本直齋書錄解題），可謂周易復古運動的先驅。胡一桂的一段話可證呂大防在周易復古運動中的地位：「古易之亂，肇

〔一〕宋祝穆撰、祝洙增訂、施合金點校方輿勝覽卷五五，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三年版，第九八九頁。

〔二〕呂大臨仲兄赴官休寧序，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八，中華再造善本。

〔三〕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六一〇頁。

自費直，繼以鄭玄，而成於王弼。古易之復，始自元豐汲郡呂微仲，高山晁以道繼之，最後東萊先生又爲之更定，實與微仲本暗合，而東萊不及微仲嘗編此，蓋偶未之見也。」（朱彝尊經義考卷十九引胡一桂語）

三、呂大鈞

呂大鈞（一〇三一—一〇八二）^{〔一〕}，字和叔。嘉祐二年（一〇五七）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馮從吾關學編卷一）後因擔心父親年老體力不支，代父入蜀爲官，移綿州巴西縣。熙寧三年（一〇七〇）韓絳宣撫陝西時，辟書寫機密文字。翌年，移知福建侯官縣。熙寧七年（一〇七四），呂賁過世，呂大鈞丁諫議憂，此後數年居家講學。晚年，起爲諸王宮教授，尋監鳳翔船務，官職改爲宣義郎。元豐五年六月，感疾，卒於延州官舍。

呂大鈞「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雖然與張載爲同年進士，但敬佩張載的學問，往執弟子禮，使范育、蘇昞等關中學子「靡然知所向矣」（伊洛淵源錄卷八）。他的兄弟呂大忠和呂大臨也拜師張載門下，三人因此并稱「藍田三呂」。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呂大鈞是北宋時期關學學派形成的重要推動者。張載去世後，兄弟三人轉投二程之門。呂大鈞的主要著述有四書注^{〔二〕}、詩說、藍田呂氏祭說一卷、誠德集三十卷。

這裡需要單獨提及的是呂氏鄉約、鄉儀。呂氏鄉約舊題呂大忠作，這大概是因爲該書未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熙寧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呂大忠白」一段話造成的。南宋時，理學家朱熹根據其時呂氏鄉約載於呂和叔文集，篇末又附答伯兄、答仲兄、答劉平叔幾封書信，斷定此書是呂大鈞所定。朱熹還指出，篇末之所以署呂大忠的名字，是由於他是長兄的緣故。然而，宋史呂大防傳卻記載呂大防曾經撰著鄉約，明代關學傳人王承裕則認爲鄉約是

〔一〕呂大鈞生卒年據范育呂和叔墓表云「元豐五年……呂君和叔卒」，「享年五十有二」推斷。

〔二〕呂大鈞撰有四書注，見明馮從吾關學編卷一，又見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一。

「呂氏兄弟相與論定」(關中叢書本呂氏鄉約、鄉儀)。從鄉約末幾封書信的內容，加之北宋時呂氏鄉約刊刻皆署名呂大忠等史實看，「實際情況應是呂大鈞起草鄉約，然後徵求兄長意見，最後定稿，以呂大忠之名義公之於鄉黨予以推行」。^①鄉儀舊題蘇昞作，朱熹也推定其為呂大鈞的著述。這個見解廣為學人所接受，表現在南宋後呂氏鄉約和鄉儀刊刻時均署名呂大鈞。以現存版本觀之，至遲到明代王承裕，二書就已經合刊。

呂氏鄉約主要從四個方面要求同約之人，即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和患難相恤。為了保證這幾項約定的順利實施，鄉約還設置了罰式、聚會和主事等保障機製。鄉儀則是對賓儀、吉儀、嘉儀和凶儀的具體規定。毫無疑問，呂氏鄉約、鄉儀是基於推廣儒學之禮而作的，在那個佛老盛行的年代，它「把儒家精神，客觀化，具體化，普遍滲透進社會羣衆之日常生活裡，來代替宗教團體之任務」，^②具有從實踐層面為儒學復興辟除佛老障礙的某些功用。

四、呂大臨

(一)生平著述

呂大臨，字與叔，號芸閣。關於他的生卒年，歷來就有爭議。^③我贊同李如冰的觀點，認為呂大臨的生卒年是一〇四〇—一〇九三年。生年應根據距他時間最近、與他關係最緊密的他的二哥呂大防為他寫的祭文推斷。祭文中，呂大防

① 李如冰宋代藍田四呂及其著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一二七頁。

②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一二頁。

③ 見陳海紅呂大臨理學思想研究，兼論浙東學派的學術進程，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第一〇頁。還有一〇四六一—一〇九二年說（陳俊民藍田呂氏遺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六一七頁；文碧方關洛之間——以呂大臨思想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版，第二頁）。一〇四八—一〇九四年說（張波呂大臨生卒年及有關其祭文之作者考辨，唐都學刊二〇〇九年第二期）。一〇四〇—一〇九三年說（李如冰呂大臨生卒年及有關問題考辨，寶雞文理學院學報二〇〇九年第六期）。

說：「吾十有四而子始生。」又，據宋史呂大防傳，呂大防「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遂薨，年七十一。」紹聖四年即一〇九七年，一〇九七減去七十一等於一〇二六，由於中國古人使用虛歲，故呂大防生於一〇二七年。他十四歲時呂大臨出生，則呂大臨生於一〇四〇年。關於呂大臨的卒年，李如冰從伊洛淵源錄、秦觀、蘇軾的詩文三個角度考證，結論令人信服。此處，我們再加一條證據。二〇〇六年三月至二〇〇九年十二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對藍田縣五里頭村北宋呂氏家族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文物中有一個石敦，上銘：「嗟乎！吾弟任重而道遠者夫！宋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呂君與叔石敦。元祐八年癸酉十一月辛巳從兄大圭銘。」銘文清楚地顯示，這是呂大臨的堂兄呂大圭送他的石敦。問題在於，此石敦是呂大圭在呂大臨生前送給他，還是在呂大臨去世時表示悼念的隨葬品呢？從銘文看，應該是呂大臨去世時的隨葬品。因為其中的「任重而道遠」出自論語泰伯，論語中的全文作：「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也就是說，「道遠」表示「死而後已」之意，呂大圭的銘文是在稱讚呂大臨的「仁以為己任」和「死而後已」。如此，銘文中標明的「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也應該是呂大臨去世的年份。以下，簡略敘述呂大臨的生平事跡。

治平元年（一〇六四）閏月五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呂大臨曾在高都與冠卿、仲文、退仲、正夫、明叔等五人交遊。^①治平二年（一〇六五），^②呂大臨及第。宋神宗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到熙寧十年（一〇七七），與其兄呂大忠、呂大鈞一道問學於張載。張載去世後的第二年（一〇七九），轉投二程門下。元豐年間，曾任邠州觀察推官。^③元豐三年（一〇八〇），陪同

① 呂大臨別高都諸友序，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一六八。

②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目錄第六頁左。清劉於義陝西通志（四庫全書本）卷三十和清呂懋勛等修、袁廷俊等纂藍田縣志（清光緒元年刊本）卷五均載呂大臨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及第。按照越早出現的書籍記載越可靠的原則，我們採用宋朝記載的治平二年（一〇六五）的說法。

③ 呂大防長安圖記，宋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八，四庫全書本。